

郭玉良的妻子张桂芳产后大出血死亡,欠下53万元手术费。对一个进城打工的农民工来说,53万元债务,不亚于一座大山。

需要 106 年来偿还的医疗账单

■张伟

郭玉良原本有个普通而温暖的家庭,但突如其来的意外不仅夺走了妻子的生命,还使他欠下医院53万元的巨额债务。医院曾与他商议,让捐献其妻的尸体用作医学实验,从而免去其全部债务。但他犹豫再三,不忍心妻子再受“打扰”,决定“欠债还钱”。对一个进城打工的农民工来说,53万元债务,不亚于一座大山。而他许下愚公的决心,决心“挖山不止”。他与医院签下协议,分106年偿还这笔债。他算过,到自己孙子这一辈,就能还完。

在这之前,尽管行程非常匆忙,门外,老乡的白色两厢轿车早已等候在那里。可他依然细心地一遍遍收拾着衣物。这包括两双旧鞋,几件旧衣服,以及一张四方尼龙纸。当然,最重要的是妻子张桂芳的骨灰盒。

所有在医院见过郭玉良的人众口一词:他是个特别疼爱妻子的丈夫。妻子的尸体在冰冷的太平间里躺了6个月后,这天上午终于穿上他特意买的新衣服,火化成一捧骨灰。火葬场出具的收据上写着花费:护灵花20元,骨灰袋5元。

这是他为那个“爱撒娇”的伴侣花掉的最后一笔钱。以前,他顶多只给她买些小零食,或者一把梳子。就在妻子去世前不久,他算计了两个月,终于花140元买回一件黑色羽绒服——这是妻子生前穿过的最贵的一件衣服。

在北京市清河马营村这间租来的8平方米的小屋里,郭玉良和妻子静候着第二个孩子出生。出工回来,看着大腹便便的妻子转身不方便,他总是亲自做好饭,端到她跟前。闲下来,两个人算着,再打几年工,就回到老家的小村子里“踏踏实实过日子”。

如今,这一切都成了泡影。2007年7月27日,因为剖腹产手术后大出血引发的持续高烧、腹腔血肿、胃溃疡、脾梗塞等症状,经过47天抢救后,妻子死在手术台上。

这天,面容憔悴的丈夫将带着妻子的骨灰,搭乘老乡的汽车,汇进返家过年的人流中。

结婚7年来,他们俩人一直互相扶持。如今,一个人生走到了终点。她的归处,是村头一片冻土上的小小坟包。因为孩子尚未成人,不能为她举行葬礼。

另一个人的黑暗则刚刚开始。郭玉良的口袋里,揣着一份为期106年的还款协议,协议另一方是北京大学第三医院。由郭家人起草的协议白纸黑字,双方用黑色墨水签下字据,约定:郭玉良每年偿还北三医院5000元,所有欠款,分106年,由子孙三代还清。

妻子给郭玉良留下了两个孩子:5岁的女儿和一个刚生下来的健康男婴。同时,还留下了53万元手术费欠款。不过,这笔巨款没有换回妻子的性命。

噩耗传出时,一直等在外面的郭玉良,“一下子泄了气”。

以前,再拮据的生活也没把这个28岁的外地农村青年压垮。自2001年,郭玉良离开老家河南正阳县张湾村来到北京后,一直在同一家公司打工。他的工作,是为这座城市里的居民安装空调。

而结婚刚半年的妻子,则需要到广东打工,以偿还结婚时欠下的钱。从此,小两口聚少离多,郭玉良轻易就能算出他们在一起的日子有多久。2002年,第一个孩子出生时,两人在一起待了半年,又分别离开家,仍然是一个在北,一个在南,每年春节的十几天,才可以聚在一起。

最后一次双双离家时,郭玉良向妻子许诺,再过几年,赚点钱就把她送回家,只用她看孩子。这个农村青年对生活充满期待。“虽然日子过得很一般,”他说,“但是我们很知足。”

过了不久,妻子从广州来北京探望他。两人决定,再要一个孩子。那是2006年的夏天。妻子很快怀孕了,在每月210元钱换来的爱巢里,两人安心地等着孩子的出生。每天,郭玉良外出工作,妻子则在家休息。附近住的全是老乡,她喜欢到别人屋子里串门。

邻居记忆中这个面色红润的年轻女人,穿着普通,从不化妆,唯一的护手霜是丈夫的姐姐送的。她有一根黑发扎成的长辫子,常用笑话逗得人们放声大笑。而她的丈夫在她面前,总是很殷勤。

接生的医院早就看好了。上地医院在这片打工者聚居区名声很大,从电视里反复播放的广告来看,它是专为低收入的外来务工人员量身定做的好去处:便宜,利民。以前周围有人生孩子,都去那里。

于是,2007年6月9日,郭玉良带着4000元钱,把妻子送到上地医院。他毫不担

心,之前的两次B超检查显示,胎儿很正常。他心里琢磨着,最好这次是个男娃。

凌晨5时43分,妻子剖腹产成功生下一个男孩。郭玉良片刻不离地守护着妻子。不过,手术似乎并不顺利,因为产后出血,把身下的棉垫子都濡湿了。输血之后,郭玉良还看着妻子吃下一块西瓜。

谁知,情况急转直下。一份诊断书记录了当时妻子的情况:产后出血、妊娠期急性脂肪肝、DIC(弥散性血管内凝血),必须转院。

6月10日凌晨,上地医院的救护车将张桂芳送至北医三院。从这一刻起的47天里,北医三院急诊室外走廊里的椅子,成了郭玉良的栖身之地。除了偶尔到附近的小饭馆里,花3元钱吃碗刀削面,他很少离开这里。

而关于妻子的消息,时好时坏,不断传入他的耳朵。

家里凑了4万元打到他的银行卡上,这些钱在4天以后便花光了。“只要能保住妻子,花多少钱也愿意。”他说。

医院没有停止抢救,不过欠款的数字迅速增加。当这个数字是9万元的时候,他一咬牙想,只要妻子健康,两个人还年轻,总能还得上。

很快,这个数字变成了20万,这对郭玉良来说是一个算不过来的数目。此前,他最大一笔开销,是花了近3万元,把自己的茅草屋翻盖成了两层小楼。天方夜谭般的数字让他有些崩溃,而妻子的病危通知书,则一次次交给他。

“要不,咱放弃治疗吧?”他跟同样哭个不停的人商量。毕竟,他还有俩孩子要养活。这个意见遭到医生的反对。他们认为,抢救她的生命很有希望,希望他们不要放弃。

郭玉良把所有的可能性算了一遍。等妻子康复了,他回家,找亲戚们凑一凑,再想办法到银行贷点钱,能还多少,全都给医院。

不过,他也不知道这肯定不够,干脆,把自己卖给医院得了,“只要医院不嫌弃,我给他们打工还钱”。这时候,他已经有几十天没睡一个囫囵觉了,衣服皱巴巴,头发乱糟糟,满眼红血丝。

其间,妻子病情曾一度好转。一见到丈夫,她就号啕大哭,担心自己的孩子出了问题。为了让她安心,郭玉良借来一台数码相机,拍了几张儿子的照片给她看。模模糊糊的照片,让这个女人获得了离世前的最后一次开心,但她最终也没有见到自己的孩子。

7月27日这天,郭玉良见了妻子最后一面。与死讯同时来的,还有欠款的最新数目:53万元。医院打印出的医药费清单上,清楚记录着47天抢救过程中的每一笔花销。

因为没交钱,妻子被安置在医院的太平间里。后来,这家医院装修,她又转移到另一家医院的太平间里存放。她的丈夫,则被53万元巨额债务缠住,连看她一眼,都开不出证明。

“欠债还钱,天经地义。”安葬完妻子的郭玉良,已经能平静地解释自己的动机。他觉得北医三院已经“帮了大忙”,毕竟他们在没有交钱的情况下,抢救过自己的妻子。“咱凭良心说,不能因为人没救活,就不承认这个。”

可是,这个连合同都没签的打工仔,想不出自己有任何办法,可以找到这笔钱来还账。他曾托家人到最初出事的上地医院“讨个说法”,但对方态度冷淡,爱理不理。

要打官司,找来的律师兜头一句话是:不管输赢,先拿两万元。“农村户口,赔不了几个钱,算了。”有人劝他。

绝望之时,媒体介入。而此时,北医三院也提出两个方案供郭玉良选择:一是将妻子的遗体捐献出来,做医学实验,便可以抵消欠款,一是分期还款。

农村人郭玉良想都没想,就放弃了第一个选择。他无法忍受,受了太多罪的妻子死后还不得安宁。

可是,分期还款每年要还多少呢?最开始,这个数字协商的是每年1万元,他算了一下,自己还不起这么多。

“你总不能说每年还100块吧?”说话的人有些着急,郭玉良心里也很忐忑,怕医院不接受。最后,他在协议书上,为自己算了笔账:空调安装工人在5~7月份是赚钱的最好时段,每个月可以赚“2000元左右”,这个数字随着月份推移逐渐变成“1000来块钱”,然后是“600元到900元”。最少的时候,他每月甚至只能拿到“300元到400元”。

这些钱被如此分配:生病的父亲每年1500元生活费,女儿上学每月花掉300元,而儿子的奶粉钱则被精确地计算为每月624元。这样算下来,郭玉良写道:每年最多还5000元。

“还一辈子。”他接着写,然后又把这句话说划去,改成“子孙三代还完”。

“其实,这对我来说真是太多了。”郭玉良事后有些担忧。他说了句“不好听的话”,万一自己突然死掉,或者没了工作,“能不能还上这笔钱真不好说”。

他情绪很不稳定,声音一会儿变高,一会儿低沉。但是,“欠债还钱”4个字,总是反复在他嘴里出现。除了医院的钱,他还欠亲戚的8万元钱要还。而自己所在公司的大老板,在关键时刻借给他1万元,他也铭记在心。

“你的事可别牵扯到公司。”对方叮嘱。郭玉良一口答应。在他看来,人家能帮自己,就是一份莫大的恩情。这钱虽然现在没有,但将来,一定要还!

他是个知恩图报的人。老板看他可怜,将一间闲置的房子给他住,他心里愧疚,主动把打扫这片院子的活儿也包揽下来。

而他的妻子,终于也在一名外地老板的资助下,缴纳了停放费用,得以火化。

几个月不见,以前面色红润的妻子,如今装在一个发黄的停尸袋里,脸已经变成紫色,眼睛深凹着,“十分吓人”。可是他反复摸着妻子的脸,情绪一下失控。

“他太重感情了。”姐姐略带埋怨和心疼,评价自己的弟弟。妻子的所有东西,衣服、鞋子,除了有几件送给亲戚外,其余的,他叠得整整齐齐,装到一个箱子里。

一件都不落,甚至连妻子怀孕时吃的奶粉,如今只剩下个盒子,他也仔细收好。他认为,“这些可以留下来,当个纪念”。

那间掉漆的铁房门刚关上,郭玉良又推开进去,翻了半天,找出厚厚一叠报纸。这些报纸上报道了他的故事。他决定,“如果留得住,等孩子长大了,给他们看”。

这些孩子在还没懂事的时候,就背负了一笔巨债。代他们做出决定的父亲,如今已经逐渐找回了生活的勇气。

在一团糟的生活里,他逐渐找到了方向。妻子已经下葬,春节结束后,他安顿好孩子,还得到北京这座城市,希望靠自己的手艺赚钱。而下一回再回到北京的“家”里,就只剩下他一个人了。

到时候,这座现代化都市的忙碌人群中,人们也许还能看到郭玉良的身影。他迈着略有些外八字的大步,背着一生都还不完的巨额债务,慢慢地苦熬。



1月31日下午3时,郭玉良最后瞥了一眼自己在北京安身的小屋,踏上了归途。